

易順鼎 著

王 飈 校點

中國近代文學叢書

# 琴志樓詩集

上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琴志樓詩集 / 易順鼎著; 王飈校點. —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 
2004. 4

(中國近代文學叢書)

ISBN 7—5325—3569—X

I. 琴... II. ①易... ②王... III. 詩歌—作品集—中國—近代 IV. I2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3)第 089368 號

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

責任編輯 李保民

中國近代文學叢書

琴志樓詩集

(全二冊)

易順鼎 著

王飈 校點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、發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[www.guji.com.cn](http://www.guji.com.cn)

(2) E-mail: [guji1@guji.com.cn](mailto:guji1@guji.com.cn)

(3) 易文網網址: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53.875 插頁 12 字數 887,000

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—5325—3569—X

I · 1662 定價: 120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 請與承印廠聯繫 T: 64063949

## 前言

博瞻之學人每有獨異之見地。譬如史學家蔡尚思先生，他在《中國文化史要論》中概論「文學史上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圖書」，於清代詩人少所許可，獨推二人：「其異於前代者，清初有李柏，清末有易順鼎。」<sup>①</sup>蔡先生之着眼處，顯然在詩歌的獨創性，以爲「易順鼎的詩有特色」，「他作詩特長於對仗，就這一點而論，確實是超越古人的。」<sup>②</sup>然而也如蔡先生所說，李柏的詩「未爲古來學人所注意」，至今諸多文學史著述中仍未見太白山人及其《櫟葉集》蹤影。易順鼎的名字雖時有出現，而貶抑之評居多，且迄今尚無一篇專論。其原因，除時代風趨和評家眼光之外，可能還在於未能全面掌握易順鼎的詩作。因爲易順鼎的詩集既多且散，迄未編定全集。以《近代詩鈔》編者陳衍閱詩之夥，其所列易順鼎詩集尚且不全，則其他能悉數全讀易氏之詩而後論者，恐爲數不多。因此，整理一部較全的《琴志樓詩集》，就很有必要了。

## 一

易順鼎（一八五八—一九二〇），字實甫，亦作碩甫、實父、石甫；又字中實，亦作仲碩。少年時自號眉伽，中年後號哭盒，亦作哭庵、哭厂。湖南龍陽（今漢壽）人。

易順鼎中年自撰《哭盒傳》，曾說自己「初爲神童，爲才子，繼爲酒人，爲游俠，少年爲名士，爲經生，爲學人，爲貴官，爲隱士」。其「神童」之稱，非僅一般聰穎過人之謂，還包含一段奇特的經歷。他從三歲就開始識字、背詩。不久，父親易佩紳奉命率湘勇赴陝西防堵太平軍西進，順鼎也隨母入陝，居漢中。同治二年（一八六三）八月，太平軍攻破漢中城，亂中順鼎與家人被衝散，誤入太平軍啓王梁成富營中。啓王詢知其來歷，即知會易佩紳，允許贖回。而易佩紳已撤營，順鼎遂留啓王軍中半年多。後來他自己描繪，太平軍對他像「小王子」一樣照顧。直到次年春，啓王回援天京，在鄂北遭僧格林沁部阻截，順鼎纔爲清軍所獲。見這位王爺時，他一點不膽怯，僧格林沁聽不懂他的湖南口音，他就用手指蘸唾沫在僧格林沁手掌上寫字。僧王很驚異，命取筆硯，順鼎寫明父親和自己姓名。僧格林沁大喜，贊嘆：「奇兒也！」抱坐於膝，親自命令應山知縣好好把他送回。這時他纔六七歲，於是「神童」之名，一時傳遍。這是他平生第一件得意事，後來他以及旁人都屢屢提起，直到四十五歲那年，慈禧太后召見他時，榮祿還

當殿向慈禧講這段故事——這也是他很得意的。

童年經歷在他心理上積澱成什麼樣的「情結」，有興趣者不妨研究。我們祇是感覺到，這段遭遇，似乎是他一生的某種「象徵」或「預示」：他生活在一個社會矛盾激化的動蕩年代，本不在漩渦中心，被捲進——後來則是竭力擠進——漩渦，却始終祇處於邊緣。對留在太平軍中這件事，他後來謂之「陷賊」，不過並未見他有咒罵太平軍的惡語（有時還表現出對「賊」印象不壞），恰如後來並未見他反對維新派或革命黨（而且還曾和黃遵憲、梁啟超等唱和），但也不支持，更不參與，以免再「陷」黨禍。對王朝的危機、官僚的無能和百姓的困苦，他有所體察感受，也想有所作為，却始終把期望寄託在僧格林沁那樣的權貴達官的賞識提攜上——先是張之洞、劉坤一，後是榮祿，最後是袁世凱。然而在這些達官乃至「總統」眼中，易順鼎仍然祇是一個「神童」——小時候是可憐又可愛的神童，長大了是可愛而可憐的才子，如此而已！

「神童」很快成為「才子」。十四歲入縣學，十六歲補諸生，已刻詩詞各一卷。十八歲就考中了光緒元年恩科舉人，隨即赴京會試，少年得志，裘馬清狂。但後來就不順了，而且似乎再沒有順利過。考進士屢不中，二十三歲時納資捐了個刑部郎中。這期間，他父親由安順知府歷官至貴州按察使，在黔多年，後又遷四川、江蘇布政使。他侍父於任所，應試赴京師，往來於黔、蜀、湘、贛、吳、楚、齊、燕等地，遍游峨嵋、青城、瀟湘、洞庭、金陵、鄧尉、泰岱、廬山等山水名勝，此其所謂「游俠」。每游一地，集詩成卷，

並與黔中、湘中、京中詩人連句唱酬，詩鐘雅集，此其所謂「名士」。此期他際遇了兩個對他頗有影響的人物。一個是張之洞。張之洞較早就賞識「實甫，曠世才也……度若才，何學術不可躋？」於是順鼎「執贄請業，學益大進」<sup>③</sup>。從始列張之洞門下後<sup>④</sup>，他幾乎追隨了一生。另一個是王闓運。易佩紳任四川布政使時，王闓運主持成都尊經書院，又是湘人，頗多往來。王闓運對易順鼎不太欣賞，但也時有指點。易順鼎撰《經義廷撞》、《淮南許注鈎沈》等學術著作，約在此前後。此其所謂「爲經生，爲學人」。然而他心不在焉，「所治皆不能竟其業」<sup>⑤</sup>。第五次會試落第後，不得已，三十歲改捐試用道，分發河南。兩年內，先後充釐稅、賑撫、水利等局會辦、總辦；黃河決口，又督修賈魯河河工；還監考河南鄉試，任三省河圖局總辦。以此被保薦爲候補道，加按察使銜，二品頂戴，此其所謂「爲貴官」。其實這「貴官」仍是待補虛銜，「日聽衙鼓覺身閑，月費官錢慚食冗」（《己丑歲朝長句一首》），於是乞病請假，在廬山築琴志樓以居。「玉堂他日懷人處，應在香爐暮靄間」（《送余誠格壽平入都時將訪匡君即以志別二首》），似乎將入山不出了，此其所謂「爲隱士」。張之洞惜其才，又聘他任兩湖書院教席。不久母逝，他廬墓守孝，「誓以哭終其身」，自號哭盒。

《哭盒傳》所言，祇是其前半生。這一時期，正是太平天國被鎮壓之後，清王朝暫時相對穩定時期。所以，雖然「書生也有先憂意，太息瘡痍尚未蘇」（《酉陽驛》），但仕宦不違，尚能悠游。而他後半生，局面就大變。

一八九四年夏，易順鼎服孝滿一年（古所謂「小祥」），甲午戰爭爆發。他激於愛國義憤，也出於建功揚名的希冀，「墨經從戎」。時兩江總督劉坤一奉旨以欽差大臣守山海關，招他入佐軍幕。他先北上詣闕，上《條陳時事疏》，倡言「今日之要義，一在有戰無和，一在先罰後賞」，請先罰李鴻章、放逐李蓮英，並提出移行都、用宿將等十項建議。請都察院代奏，不報。年底，赴山海關，在軍中幫辦文案。一八九五年四月，聞《馬關條約》簽訂，立即再赴京師，上《請罷和議褫權奸疏》，力陳「醜虜跳梁，不宜遷就」，權奸誤國，不可姑容」。疏中公然責問：「遼東者，北洋之藩籬；臺灣者，南洋之門戶」，割遼、臺，賠巨款，「坐使赤縣神州，自我而淪為異域」，「海隅蒼生，自我而化為他族，皇太后、皇上將如天下百姓何？」並指出：「各國狡焉思逞之計，貪得無厭」，今日揖盜門內，納虎室中，則各國「他時欲壑，恐更甚於今，中國將來必無可存之地」；「以斯民有盡之脂膏，填彼族無窮之溪壑」，「中國將來必無可籌之餉」；如此則「兆姓寒心，四方解體」，「中國將來必無可固之民」。直斥李鴻章及其子李經方「賣國之心與其誤國之術」，請革職治罪<sup>⑥</sup>。此疏在當時很有名，但他明斥李鴻章，却暗含對慈禧的指責了，當然不會有結果。旋返軍營，請求劉坤一以「偵探情形」之名派往臺灣。當時基隆、臺北已失，臺灣巡撫唐景崧等紛紛逃回內地，丘逢甲守臺中不利也已內渡。這時，居然有一位道臺大人從大陸渡海而來，對劉永福和堅持抗日的臺灣軍民，無疑是極大鼓舞。臺南百餘文武，以劉永福和他為首，歃血為盟，「誓同死守，不肯事仇」。紳民甚至上公稟，稱他「不辭險阻，遠涉滄溟，視萎靡退縮者相去霄壤」，請他權理臺灣道篆。他雖未即

允，却非無此意。先同劉永福議率兵援守臺中，後慮兵將不熟，改爲回內地籌餉。劉永福另派一位主動赴臺抗日的志士吳彭年援臺中，後吳彭年戰死彰化，血染八卦山<sup>⑦</sup>。易順鼎先至南京見兩江總督張之洞，又至武昌，請署理湖廣總督譚繼洵（譚嗣同之父）發電函給兩廣總督譚鍾麟，皆求接濟臺灣。而此時清廷已下令「嚴禁海口」，張之洞不敢助餉，還是同官公籌了義款萬餘兩。於是易順鼎第二次赴臺。然而此時臺南形勢已緊急而混亂，劉永福手中缺餉，左右無將。易順鼎見事已難爲，八月初返回廈門。忽接陳三立自武昌急電，稱「有密旨令南洋接濟臺灣」（「南洋」指劉坤一），同時聚集在廈門的臺北難民也向他陳訴「室家廬舍爲倭所焚，田園產業爲倭所奪，恨倭切齒，日圖報復」，聯名稟請他爲「臺灣民主國副總統」，而且刻好了「臺灣民主國副伯里璽天德之章」。不料隨即一日內接到張之洞連發三電，稱「接濟臺灣」純屬謠傳，令他速離廈門，否則祇有「請旨飭令回籍」。湖北按察使陳寶箴又請出他父親，電令速歸。九月初，臺南失陷，劉永福也退回<sup>⑧</sup>。易順鼎助臺抗日的希望破滅，無功而返。唯一的收獲，是他北上詣闕，東投從軍、南下援臺、失望歸湘所作詩，集成了《魂北》、《魂東》、《魂南》、《歸魂》四卷，即著名的《四魂集》。

這段經歷對他的影響很大而且複雜。此後兩年，正是維新變法運動高漲時期，湖南試行新政。而易順鼎雖就在湖南管督銷鹽務，却全不參與，與其父設壇扶乩，與「仙靈」唱和。誠然，他心中猶存不平，扶乩詩中還出現「中朝大度慣包涵，割地難將谷塞函。惹得仙人成一笑，從來宰相面多藍」這類

詩<sup>⑨</sup>。但他似乎總結「教訓」，選擇了從此再不「違旨挑釁」，而竭力靠攏中樞權臣的道路。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入侵，慈禧逃西安。易順鼎從南京疾行千餘里，「麻鞋赴行在」，希望在這危難時刻表現自己的忠心。他的詩友樊增祥正是在此期間受到慈禧青睞而高升的，他却一無所獲，還是張之洞、劉坤一保薦纔得了個督辦江楚轉運的差使。他曾請張百熙在榮祿面前幫忙，但榮祿也祇以詩人視之。不過榮祿似未忘記他，在慈禧面前說了好話，光緒二十八年（一九〇二）他終於實授廣西右江道，旋調太平思順道。

他到任後辦了些實事，可是纔三個月，就被參劾革職了，這又是他第三件「有名」的事。當時兩廣總督岑春煊和督辦邊防的鄭孝胥，因廣西「盜匪」衆多，綠營不力，決定裁撤綠營，邊餉全數改撥給巡防營，地方餉銀自籌。易順鼎反對，稱：「災燹之後，民窮財盡，更從何處搜刮？」一再電爭。岑春煊斥責他：「不過欲藉此增募兵役，多領餉項，以爲自利之計，實屬荒唐！」易順鼎又現出了狂態，覆電反譏：「爲憲臺保桑梓，爲朝廷保地方，順鼎並不荒唐，恐荒唐別有人在！」<sup>⑩</sup>觸怒岑春煊，以「名士畫餅」「不諳治理」劾罷。所以後來易順鼎自嘲：「『名士畫餅』爲余一生最著之典。」<sup>⑪</sup>

此後他祇好回到張之洞處佐幕。因父逝服孝三年後，即赴都察院自呈被參冤抑。適張之洞擢體仁閣大學士，軍機大臣，易順鼎也向另一位軍機大臣袁世凱獻詩祝壽。於是開復原官，光緒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）末授雲南臨安開廣道。未及赴任，次年（宣統元年）調廣東欽廉道，又署廣肇羅道，移高雷陽道。但是，他實任清朝的官不足三年，辛亥革命就爆發了。

一九一二年後他先居上海，後到北京。民國初年的易順鼎，思想感情相當複雜混亂。清亡後許多人紛紛剪辮，遺老則堅持留辮。易順鼎一度仍留着辮子，却寫了一首《告剪髮詩》，特意表明自己不剪髮並非出於對清室表示忠誠：「自從皇綱一解紐，新政舊政紛蝴蝶。西園賣鬻競煊赫，東樓賄賂尤昭彰……又有受恩深重者，高官大爵爭輝煌。國家無事則富貴，國家有事則叛降。富貴叛降固自在，反稱黨魁據中央。此世界是何世界，狗彘盜賊兼優倡。」恐人疑我死一姓，我死一姓何芬芳？昔非堯舜薄湯武，今侶禽獸依犬羊。……恐人疑我忠一姓，我忠一姓殊駭狂。」我髮本爲個人惜，微時故劍同難忘。看來他的思想與遺老有所不同，對前清並無太多留戀傷感，對民國初年的混濁局面也不滿，尤其鄙薄那些前清高官搖身一變而爲民國「黨魁」。依此類推，應當包括袁世凱。然而他又依附袁氏，謀得了一個政事堂印鑄局參事之職，還曾因印鑄局長外出而兩度代理局長，並任全國選舉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。實際上，他已無心功名政事，祇把這些當作謀食差事。這也是士大夫文人的悲劇：除了謀個一官半職，別無生機。所以日與袁世凱之子袁克文及其周圍一批文人樊增祥、羅惇齋等觀戲聽曲，詩酒酬應。袁氏倒亡，他失去衣食之源，晚年潦倒以終。

易順鼎的一生有點悲劇意味。這種悲劇帶有最後一代士大夫文人的共同性。他不僅生存在一個王朝末世，而且是一個時代更革的變世。雖然他有時自負大才，然而觀其一生，憂國憂民之心誠有之，宏識遠見却談不上，對已經發生的新的時代潮流和思潮，有意無意地疏離以至隔膜。其奏疏稟牘所論

時弊尚中肯綮，具體建議却多不得要領，「名士畫餅」之譏，並非完全落空。因此，他雖然看到末世的危機和弊病，甚至不滿、不平，却仍祇能依附於它，成為時代悲劇中的一個角色。同時他命運的悲劇又帶有個人特點。他曾說自己「操行無定，若儒若墨，若夷若惠，莫能以一節稱之」<sup>⑩</sup>。致陳三立信又說：「平生擇術，不好孔孟，而好楊墨」；平生操行，不喜仁義，而喜煦<sup>⑪</sup>。冥頑不靈，放達不羈。其自視也，若輕而若重；其自命也，忽高而忽卑。不屑爲理學，不肯治其私，以爲有害於人，有害於心，則不可爲。<sup>⑫</sup>這些觀念，確實不同於其他士大夫。他有兩句詩可以說明這種狂放不定的操行與矛盾性格的來由：「三十功名塵與土，五千道德柏與糟。」（次韻江徽戲成一首）否定了（實際上未全部拋棄）傳統的準則，却又沒有新的觀念填充。因此，與前代一些執着理想而睥睨世俗的狂士不同，這是一個因時代巨變動搖了傳統價值觀，失去了信念支撐也失去了道德羈絆的末世才子。他一生所成就的，也許祇有詩了。

## 二

易順鼎的詩，有人說不下萬首<sup>⑬</sup>，他自己說有數千首，但今存易順鼎已刻詩集中的詩，不足三千首，其他或未刻而已佚，或已刻而不存，或散見於他處。其中數量較多的是山水游歷詩。易順鼎仕途不順，

多年奔走各地，却也使他能不受官身宦跡所拘，放情山水。他自稱「生平所爲詩不下數千首，蓋行役游覽之作居其大半，而山水詩尤多……嘗游泰山、青城、峨嵋、匡廬、華山、終南」，「又游羅浮、天童、普陀、洛伽，詩益放恣」<sup>⑤</sup>。其許多詩就以所游山水、地名爲集，並專輯登臨名山之作爲《琴志樓游山詩集》。其中最著名的當推《廬山詩錄》。他曾選錄若干首呈張之洞，張之洞親加圈點，評爲「瓌偉絕特，如神龍金翅，光采飛騰，而復有深湛之思」，賞獎備至<sup>⑥</sup>。陳三立比之魏源，易順鼎却說「魏詩皆在山水內，而余詩尚有在山水之外者」，指他「飽歷世變及憂患危苦，於是悉以身世之故寄託於山水之間」<sup>⑦</sup>。的確，易順鼎的游覽寫景之作，不僅僅探幽攬勝，雕鐫奇險，而且往往滲入詩人主觀情感，賦予景物以某種意蘊。如張之洞推許爲「雄偉恣肆」、「真世間奇作」的《萬杉寺五爪樟》，寫寺前老樟：

旁達洞整根已深，直干霄空氣不饒。雲垂太陰逗雷霆，風翻白日動光彩。危柯半入煙冥冥，細葉還鋪雪皑皑。化人偉奇丈六身，猛士雄健尺八腰。全張數爪鱗之而，俯視衆木形傀。儡。古來賢豪誰撫摩，其人已死不相待。惟有五老之奇峯，共對青天無倦怠。雖言乾坤要支柱，未免得罪庸與猥。下穿已愁傷富媼，上聳又恐妨真宰。獨立無友大哉警，衆人皆忌甚矣殆。自恃刀斧莫能入，皮堅有類披鐵鎧。大才詎肯腐山林，神物猶思避菹醢。吾聞豫章生七年，便可與龍鬪滄海。何況此樹世希有，壽過凡樟逾百倍。願爲樓船擊西夷，知君九死終不悔！

有人說這首詩是頌張之洞的，恐怕未必，毋寧說這株樟樹是其心目中自我的幻化。「願爲樓船擊西夷，知君九死終不悔」，似乎是他後來渡海赴臺的預告，祇是所「擊」者是「東夷」。「雲如憂國頭催白，花是憐才淚染紅。」（《細雨大霧由函口行萬山中數十里至分界始出山作》）他不少詩都像這樣把自己的思緒感受賦予了山水景物。還有些詩，並不用擬人、比喻之類手法，而詩中仍回蕩著他的感情波瀾，或透現出他的情懷氣格。《朱陵洞觀瀑布》、《噴雪亭瀑》、《鼎湖山觀瀑布歌》、《拜松拜瀑歌》、《游白水門觀瀑布作歌》等詠瀑七古，泄其橫放狂蕩之氣。而在另一種心境下，又所謂「吾詩耽冷趣，白日常冥搜。下筆幽想來，奔赴萬古愁」（《秋懷詩三十八首》之三十七）。《天童山中月夜獨坐》等就耽於一種遠離塵世的孤寂：

青天無一塵，青山無一雲。天上惟一月，山中惟一人。

此時聞松聲，此時聞鐘聲，此時聞澗聲，此時聞蟲聲。

當然，由於其游覽之作很多，也不免意境、詞句重複或落於平俗。張之洞就指出有些詩「在他人則金玉，在作者則土苴耳」，勸他「割愛」。

其晚年所作《和天琴與鄙人共話有述韻即贈》有云：「身是四朝詩史在，氣收萬古楚騷清。」應當說「詩史」並非易順鼎詩的特點，他很少如杜甫或者同代黃遵憲那樣詠史記事，但往往在發抒感慨或寄託抱負時，透露出世事和時局的衰象。如：「圖強須遠慮，積弱漸深疴。浪擁中流楫，沙沉下瀨戈。焚艘

歸想像，卧榻聽鼙訛。往事堪悲涕，羣公但嬾嬰……杞憂拚獨語，楚調託孤哦。」（《滬上書感六十韻》）「近日中原看不得。淮河水倒流，晉豫人相食，齊魯疆連亦災國。」（《王郎行寄夢湘山東》）而最突出的，當然是《四魂集》。《四魂集》是他政治熱情應和時代怒潮的迸發，多慷慨憤激，悲歌慟哭：

橫海樓船慘鼓聲，臨淮壁壘黯旌旗。棘門灞上皆兒戲，太液昆明是水嬉。久責贊皇籌的博，空聞德遠敗符離。却將杜老陳陶痛，化作靈均楚澤悲。

——《書事》——

鼠端持兩技終窮，兔窟營三計枉工。黃屋何勞效椎髻，烏江早擬渡重瞳。蜃樓人物形才具，蟻國衣冠夢已空。如此頻波誰爲挽，焚香泣血叩蒼穹。

——《書憤》——

前一首譏甲午陸戰、海戰中清軍皆如同嬉戲，領聯刺李鴻章。後一首憤反割臺鬭爭中任「臺灣民主國總統」的巡撫唐景崧等首鼠兩端，臨陣逃逸，導致抗日保臺鬭爭失敗。他唱出了臺灣人民的愛國心聲：「痛哭珠崖原漢地，大呼倉葛本王人！」（《萬臺詠懷六首》）「但使天留人種在，珠崖還作漢神州！」（《津舟感懷四首》）歌頌抗日兵將義民：「兩河忠義旌旗在，萬福威名草木知。」（《臺舟感懷四首》）「耿耿丹衷惟許國，皇天應鑒此精誠。」也抒寫了他自己從「有客南冠甘效死，淚痕盈背血盈腔」（《感事四首》）到

無功而歸，「蠻煙瘴雨添行色，海水天風和哭聲。」（《別臺詠懷》）這都是他的「魂」東投南下時聞見經歷，悲痛泣血，情動於中。當時幾乎所有臺灣詩人，如許南英、施士潔、吳彭年、林鶴年等，遍和其《寓臺詠懷》等詩，組成臺灣詩史上濃墨重彩及洶涌着怒濤血潮的一章。

有必要略談一下易順鼎晚年作「捧角詩」的問題，這是他遭到當時和後來衆多論者垢病的癥結。但是，論者大都祇講他捧賈璧雲、鮮靈芝等，却很少有人提到，他捧得最熱烈、贈詩最多、評價最高的是梅蘭芳，甚至因此被稱爲「梅黨」。《萬古愁曲》、《國花行》、《梅魂歌》、《觀梅蘭芳演雁門關劇》、《再贈梅郎一首》……都是爲梅蘭芳寫的。梅蘭芳聲譽鵲起，易順鼎功不可沒，所以他死後，梅蘭芳還去哭奠。爲什麼不提這些？是因爲說了梅蘭芳曾被易順鼎捧過就有損藝術家清譽而爲賢者諱呢，還是因爲易順鼎捧的是梅蘭芳就不好說他格調低下了呢？此中消息，頗可玩味。恐怕這類評論多少還含有對「戲子」的鄙夷，所以捧「戲子」的詩人也就「低下」了。其實民國初年易順鼎徜徉戲樓舞臺不僅僅出於「好聲色」。其《數斗血歌爲諸女伶作》發表了一種獨特見解：「誰知中華祖國五千餘年四百兆人之國魂，不忍見此暗淡腐敗無聲無色之乾坤，又不能復其璀璨莊嚴有聲有色之崑崙。於是合詞上奏陳天閭：若謂天地靈秀之氣原有十分存，請以三分與男子，七分與女子，而皆使其薈萃於梨園。……孰言慷慨悲歌幽抑怨斷之音響不可求，可歌可泣、驚天動地乃在此輩之珠喉。請君勿談開國偉人之勳位，吾恐建設璀璨莊嚴之新國者，不在彼類在此類。請君勿談先朝遺老之國粹，吾恐保存清淑靈秀之留遺者，不在彼

社會在此社會。」其中有對民初混濁時局的不滿，有對政壇「黨魁」的嘲諷，還有對「先朝遺老」的揶揄，所以他寧可爲梨園諸伶嘔出數斗血。其言戲曲的作用固然誇張了，但以爲戲曲是「國粹」藝術，却不無見地。今日輿論不都說京劇是國粹嗎？不過易順鼎的梨園詩，除少數幾首外，大都寫得不算好，往往祇是鋪敘劇名、烘托氛圍，而對表演藝術本身着墨不多。這是另外一個問題，即其詩歌藝術性評析問題，尚可研究。

易順鼎詩中很大部分，是和韻酬答之作。與他唱和的，有不少朝中重臣，也有學界耆宿、詩壇名家，以及同僚下屬、友朋親人。這類詩，展示了他的人生和內心，也有助於我們重構世態畫面，理解歷史情景。和他贈答最多的，有兩個人。前期是陳三立。他從少年時代就和陳三立訂交，友誼持續了幾十年。這一點，過去很少有人提及，似乎沒有被發現。陳三立是同光體詩派的魁首，易順鼎是中晚唐詩派的傑才（此外對易順鼎頗多箴糾的王闓運又是六朝詩派的領軍），看來對清末各詩派之間的關係、聯繫，還需要進一步審察。這或許會是一個很有趣的課題，易順鼎的詩集可以提供很多資料。後期與易順鼎唱酬最多的則是樊增祥，有時彼此逞才，互疊至十數韻，晚年更是隔幾日便互贈和答。樊、易並稱，但兩人還各有特點。相對而言，易較樊行事更狂放，才氣也更縱橫，風格技法較多變化而不規步繩趨。所以陳衍說：「樊山始終不改此度，實甫則屢變其面目，爲大小謝，爲長慶體，爲皮、陸，爲李賀，爲盧仝，而風流自賞，近於溫、李者居多。」<sup>⑤</sup>

不過陳衍論近世詩人，喜歡說「學某人、學某人」，這是他論詩之一大病。誠然，少年初學詩者，難免模擬前人；且唐宋兩代幾乎已各體俱備，後來之作難免跡似，但未必全都有意學某家。易順鼎少時就曾表示：「初不敢依附漢、魏、六朝、唐、宋之格調以爲格調，亦不敢牽合《三百篇》之性情以爲性情。於古者所以重，及世所目爲甚輕，均未有當也。」<sup>①</sup>易順鼎詩集中，有兩類詩自具特色，是他引以自負的，而又是迭遭其師友如張之洞、王闓運、樊增祥、陳三立毀斥的。

一類是其七律，追求對仗工巧、用典精切、設色富麗、造語新鮮。前期名作如《金陵雜詩》等，而最有代表性的還是《四魂集》。這種風格雖承李商隱而來，他也因此被後人歸入「中晚唐詩派」，但易順鼎在藝術上和理論上仍有其獨創。他晚年撰《琴志樓摘句詩話》，着重就此發表議論，謂：「自信此體爲空前絕後、少二寡雙之作。蓋毀余者皆以好用巧對爲病……不知對屬爲工，乃詩之正宗，凡開國盛時之詩，無不講對屬者，如唐之初、盛，宋之西昆，明之高、劉皆然。自作詩者不講對屬而詩衰，詩衰而世亦衰矣。」余嘗有一推倒一時豪傑之論云：「無工巧渾成對仗，竟可以不必作詩。蓋塵羹土飯、人云亦云之語，雖數十萬首亦作不完，何必千手雷同，徒費紙墨乎？」自誇《四魂集》中不僅以屬對工巧爲尚也，其隸事之精切，設色之富麗，用意之新穎，皆兼而有之」。並大量摘句，以證明其「人名對」、「虛字對」、「成語對」等等如何「工巧渾成」，「自有詩家以來，要自余獨開此派」，「對仗之工，古今無兩矣」，云云<sup>②</sup>。

這番議論中，有些話說反了，如「詩衰而世亦衰」。想靠「工巧渾成對仗」來救「詩衰」，甚至救「世